

• ZHONGGUO ZHONGGU LUOJI SHI •

中国中古逻辑史



• 温公颐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ZHONGGUO ZHONGGU LIGUI SHI ·

中国中古逻辑史



—— 逻辑史论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中古逻辑史

温公颐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秦建洲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中国中古逻辑史

温公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84,000

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198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208—00344—0/B·65

定价 6.90 元

前 言

在前言里,我拟说明以下四个问题,即

1. 本书和《先秦逻辑史》的关系;
2. 中国中古逻辑史的特点;
3. 逻辑范畴研究的探索;
4. 本书的写作过程。

兹分述于下。

一、本书和拙著《先秦逻辑史》的关系。

1979年在全国哲学规划会议上,决定把逻辑科学的薄弱部门“中国逻辑史”列为重点研究的项目,并推举中山大学杨蒂荪同志、华南师范大学李匡武同志和我三人共同担任撰写工作。后杨、李二同志以健康欠佳,(李同志已作古)因而该项写作任务不得不由我个人担任。从1979年到1982年夏已完成第一卷,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提议,改以专著形式单独出版。因此,第一卷命名为《先秦逻辑史》,业于1983年5月出版。

《中国中古逻辑史》是“中国逻辑史”的第二卷,时间是从秦汉到隋唐。这样,《先秦逻辑史》也可称为《中国上古逻辑史》。继《中国中古逻辑史》之后,从北宋至清中叶1840年的第三卷则编为《中国近古逻辑史》。从1840年到1949年的第四卷,则编为《中国近代逻辑史》。这样,从古到今,集成我的“中国逻辑史”的四卷本。

本书和《先秦逻辑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先秦时代是我

国逻辑思想百家争鸣，光辉灿烂的时代，其间各家思想纵横交错，波澜壮阔，为理清头绪，采用分编撰述的方式。进入中古，形势不同，争鸣局面已经消失，逻辑思想基本上走入单一发展的道路。因此，本书采用按章分列，不用分编的方法。

本书虽和《先秦逻辑史》有如上的区别，但在逻辑史的发展上是一贯的。中古逻辑史的逻辑问题，有的是承藉古代的，如名实问题，讲神学逻辑的董仲舒也有他的名实观。有的则深化了古代，如关于类的问题。类是逻辑推论的基础，先秦各逻辑家都重视类的推论，但以类为推不是没有问题的，公孙龙、《墨辩》都提到过。《墨辩》认为“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墨辩·经下》），这还只是注意到类的大小上，还未考虑到类的实质问题。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比古代进了一步，提出类的实质问题。类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的量的方面，范围的大小，而且还在于它的质的方面，有异同。如小方为大方之类，但小智非大智之类。因此《吕氏春秋》提出“类固不必可推知”（《吕氏春秋·别类篇》）。《淮南子·说林训》也提到“类不可必推”，因礲石可以毒死人，但可以养蚕，性质各异，就不能混为一类。由上可知，中国中古逻辑史在某些问题上发展了古代的。

二、中国中古逻辑史的特点。

中国中古逻辑史的特点由它的社会政治经济所决定，略析之有四：

1. 中古逻辑思想的中世纪化。所谓中世纪化，即指中世纪时代的特征。世界三大文化系统，西方、印度和我国到了中世纪时代都染上了中世色彩。西方古代希腊文化繁荣昌盛，但到中世纪后，反陷入“黑暗时代”。印度古代宗教繁兴是一个开明时代，但佛灭后，由小乘而大乘，反被咒语迷信的气氛所笼罩。我国先秦是一个光辉灿烂时期，但到中古也为宗教迷雾所侵袭。这就是中世

纪的神学化的特点。先秦的儒家成为儒教，道家转为道教，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后，又成为儒、释、道三教鼎立之势。

中世纪化的第二个特征即复古化。董仲舒的“奉天而法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他学者亦大多引经据典，不敢逾越章句。

中世纪化的第三个特征即笺注化。复古化自然带来笺注化。这一时期的学者好象真理都被古人发现完了，只要把古人说过的加一番注释说明，就可万事大吉。汉代经师，皓首穷经，各种注疏，汗牛充栋。印度佛教因明传入中国后也不例外，高僧穷经也侧重疏证经文。

中世纪化的第四特征，即思想的杂糅化。古代百家争鸣，都“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它具有独创精神，但到中世纪，独创精神基本消失。董仲舒以儒家杂糅其他各家，《淮南子》又以道家杂糅其他之说，此其著者。总之，神学化、复古化、笺注化、杂糅化是中世纪化的四大特征。

2. 东汉逻辑的伦理化。东汉朝廷为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举孝廉秀才。东汉士人为个人升官，取得富贵尊荣，于是竞相奔走于名人之下，冀得一奖誉，以为进升之阶。这样，人伦品鉴之风盛行，郭泰、许劭都是人伦品鉴的杰出人物。顾亭林所谓“尊儒节义，敦励名实”（《日知录·卷十三》），风俗为之一变。不过这里的“敦励名实”的“名实”已非先秦旧义。因先秦之所谓实是指客观存在的物实，而“名”即指对客观“物实”的反映。东汉时所谓“名实”却另有所指。所谓“实”是指一个人具有的品德，而“名”则指社会上给某人的奖誉。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李固给黄琼信），是指社会奖誉他的名和他品德的实不副。因此，东汉的名实观纯属人伦道德的评价。这是东汉社会政治的产物，它构成了中古逻辑的一个特点。

3. 魏晋南北朝逻辑的玄学化。魏晋南北朝玄风披靡，这有社会政治的原因，也有思想转变的原因。如果我们说，东汉伦理的逻辑产生于当时的察举制度，那么，魏晋的玄学逻辑则产生于“九品中正”的门阀士族制度。“高谈虚论，左琴右书”，“迂诞浮华，不涉世务”（《颜氏家训·涉务》），正好为谈玄道虚的门阀特权人物的写照。特权人物的糜烂生活是建筑在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的基础上的，当时既有地主与农民对抗的矛盾，又有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民族矛盾，统治集团间又有争夺皇权的矛盾。他们不敢正视矛盾，妄图以形而上学的方法割裂矛盾，而择取自以为是矛盾一方，这样就产生了形而上学的逻辑思潮。

在汉魏思想转变上说，汉代的经学、烦琐的章句已不适于东汉末的政治社会环境，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首先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经学的自我否定，从经学转到玄学的清谈。

汉代的唯物主义以道家的自然说抨击了神学目的论，使唯心主义无法招架，但王弼提出自然变化的根柢，从汉代唯物主义的宇宙论转入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这样，深究本体的形而上学的探索，风靡一世。

总之，形而上学的风行使这时的逻辑也沾上玄学色彩，这又是中古逻辑思想的另一特色。

4. 印度佛教因明的传入。印度因明之传入我国使中古逻辑史增添新鲜血液，这是中国中古逻辑史的又一特色。因明最早传入我国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吉迦夜和昙曜流支合译《方便心论》，这是古因明部分。到了唐玄奘于公元645年从印度取经回国后，大量译述了新因明的重要著作，如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因明入正理论》。他的高弟窥基、文轨等又著了重要的注疏。加以当时唐帝的大力支持，因明、唯识之学盛极一时。对我国当时逻辑学界起到了不

少影响。吾友虞愚同志近著一文题为《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哲学研究》1986年,第11、12期),曾说:“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之后,早成为浩浩荡荡中国逻辑史长河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十分正确的,我同意他的意见。特别是在清代末年,从日本取回许多重要失传的因明著作之后,章太炎、梁启超等都有因明的论著,因明不但复兴了,而且更密切地和中国逻辑相结合,成为中国近代逻辑史的精彩部分。

三、逻辑范畴研究的探索。

列宁说:“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列宁全集》第38卷,194页)。可见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深入底层的更深刻的认识,它比一般概念的认识要深入得多。那么,什么是逻辑范畴,列宁也有明确的解释。他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就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同上引,第90页)。所以他对逻辑范畴下个定义说:“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念”)的各个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同上引,第212页)。自然现象之网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以各自的规律形成网上的纽结。只要能抓住这一纽结,就可纲举目张,对认识对象一览无遗了。

逻辑史的思想发展过程,也有它的网结点,这即逻辑范畴所在。对一个时期逻辑思想旨在于能寻得贯穿它的纽结,找出它的范畴。比如魏晋南北朝时代,逻辑思想的发展就分别形成了如下的一些范畴,“有无”范畴、“本末”范畴、“一多”范畴、“意言”范畴、“动静”范畴、“质用”范畴、“即异”范畴等。通过这些逻辑范畴的分析,就可以看清这一时期逻辑家争论的脉络。这样就

比仅依各个逻辑家的平列叙述，深入一步。我在本书第八章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逻辑》即用范畴分析法处理的。将来我希望能进一步写出中国逻辑范畴史，如西方哲学史家闻德尔夫特的《西方哲学通史》(W. 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然。但现在只能作局部的尝试。

四、本书的写作过程。

本书于1982年6月开始撰写，直至1986年夏才写毕，时经五个寒暑。当写至第九章时，正值1985年盛夏，汗流稿纸，但从未搁笔，幸底于成，并把打印稿分寄国内中国逻辑史部分专家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审阅。1986年10月，邀请各专家及出版社编辑部同志来津讨论。提供宝贵意见，以便进行修改。专家们对本书提了不少优点，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会后，我当即着手修改。1987年2月修改完毕，当送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付印。参加讨论会或提供意见的，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虞愚同志、周云之同志和刘培育同志；广州中山大学的杨蒂荪同志及林铭钧同志；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刘鸿钧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唐继无同志及秦建洲同志；江西教育学院的周文英同志；天津南开大学的崔清田同志。他们都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特此道谢！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大力支持，把本书列入“七五”规划中的大学参考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对于本书的出版予以大力支持，均谨致谢忱！南开大学田立刚同志对本书的抄写校对费了大量工夫，并此致谢！

温公颐

1987年2月 于南开大学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吕氏春秋》的逻辑思想	1
第一节 《吕览》的写作及其折衷主义的特征.....	1
第二节 正名逻辑的继续.....	5
第三节 别类的逻辑意义.....	8
第四节 言和辞的分析.....	12
第五节 逻辑方法的运用.....	16
第二章 《淮南子》的逻辑思想	20
第一节 《淮南子》的著述及其道家思想的逻辑特征.....	20
第二节 逻辑推理的重要意义.....	23
第三节 类概念的进一步分析.....	27
第四节 演绎的重要范畴.....	33
第五节 归纳推理的发展.....	38
第六节 小结.....	46
第三章 董仲舒的神学正名逻辑	50
第一节 董仲舒逻辑思想的中世纪化.....	50
第二节 神学逻辑的基本概念.....	56
第三节 《春秋》的推论逻辑.....	63
第四节 逻辑和语法.....	69

第五节	关于类似唯物名实观与类似辩证法的解释·····	74
第四章	《盐铁论》中的逻辑问题·····	78
第一节	盐铁论辩之由来·····	78
第二节	《盐铁论》中的逻辑问题·····	81
第五章	扬雄的数的演绎逻辑·····	98
第一节	扬雄的生平及其著作·····	98
第二节	《太玄》的数的逻辑结构·····	101
第三节	《太玄》数的规律在空间、时间和人事上 的逻辑演绎·····	108
第四节	扬雄的证验逻辑及其辩证的逻辑思维·····	121
第六章	王充的论证逻辑·····	129
第一节	王充一生的战斗性决定《论衡》一书的逻辑性·····	129
第二节	推理论·····	137
第三节	逻辑证明的意义和方法·····	155
第四节	反驳法·····	164
第五节	王充论证逻辑的贡献及其缺点·····	170
第七章	东汉伦理的逻辑思想·····	173
第一节	东汉伦理的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173
第二节	王符的伦理逻辑思想·····	179
第三节	仲长统的伦理逻辑思想·····	186
第四节	徐幹的伦理逻辑思想·····	194
第五节	刘劭的伦理逻辑思想·····	199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形而上学逻辑或玄学逻辑	205
第一节 玄学逻辑产生的背景	205
第二节 玄学逻辑的基本范畴	213
第三节 玄学逻辑中的二难推理	247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形式逻辑科学的发展	253
第一节 鲁胜在形式逻辑科学上的贡献	253
第二节 连珠推论的产生和它的发展	259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自然科学研究中演绎与归纳推理的发展	278
第十章 因明在印度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284
第一节 因明在印度的产生及其发展	284
第二节 因明与西方逻辑及中国逻辑的比较	299
第三节 因明之传入中国	303
第四节 玄奘所传因明的要义	306
第五节 玄奘传入因明后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影响	324
第十一章 刘知几的论证逻辑	338
第一节 刘知几的生平及其论证逻辑产生的时代背景	338
第二节 逻辑探究的目的与方法	343
第三节 刘知几论证逻辑的核心——矛盾律的运用	349
第四节 刘知几论证逻辑的缺点	358
第十二章 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的逻辑思想	360

第一节	柳宗元、刘禹锡的生平及著书	360
第二节	柳宗元、刘禹锡唯物逻辑的认识论基础	362
第三节	运用矛盾律对于神怪、灾异、符瑞等说的 批判.....	368
第四节	辩证逻辑思想的萌芽.....	375
第五节	柳宗元、刘禹锡唯物逻辑的缺点	379

第一章 《吕氏春秋》的逻辑思想

第一节 《吕览》的写作及其折衷主义的特征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宾客所写的一部集体著述。吕不韦作政治投机成功后，当了秦国的宰相。他鉴于当时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齐国的孟尝君都养士相倾，他招致食客三千人，使客人口著听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因此，《吕氏春秋》亦称《吕览》。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的集编，固然是在于他想藉此以炫耀关东各国，但也有他的政治意图，这就是宣扬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黄老学来作为掌握秦政权的理论依据。此点在《序说》和《序意》中都引黄帝诲颡项的话可以证明。

《序意》云：“维秦八年，岁在涒滩（太岁在申为涒滩。指万物吐秀倾垂之貌）。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吕不韦封洛阳，号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颡项矣，爰（曰）‘有大圆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又《圜道》云：“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

这里把《序意》的政治意图，讲得更清楚了。《吕览》虽是一部杂书，但它是以黄老学来糅和各家的。

《吕览》的杂，在《汉书·艺文志》中早已指出，这就是“兼儒

墨，合名法”。（《汉志》）清汪中代毕沅序《吕氏春秋》也指出这点。（见汪中：《述学补遗》下）《吕氏春秋》的杂，即表现为折衷主义，虽有黄老学的线索，但不能掩盖其“杂”的本质。何况它对黄老并无理论上的发挥，只利用它的君道无为理论呢。

以下就折衷主义的特征分析如下：

1. 折衷主义失去先秦时的独创精神。

先秦诸子争鸣，都能“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不论他们的主张内容如何，但都能有所见。《吕览》“兼儒墨，合名法”的结果，成了一锅大杂烩。缀拾各家残说，自然和各家原意相左。比如《察今》篇是继承法家变法精神的。什么“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古之命（名）多不通乎今之言”，所以提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主张。但《察今》变法理论却和法家“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精神相反。它提出要学“先王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察今》）这样，《察今》的变法和法家的“不法常可”已变了样。它是有“常可”可法的，这即人的本身。这哪里是“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唯物精神呢？

在《长见》篇中，更把变法的理论建立于“古今一度”的形而上学，和法家的“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篇）的历史进化观点背道而驰。《长见》篇云：“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之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这不是孔子的“百世可知”，荀子的“类不悖，虽久同理”的儒家论调吗？哪有半点法家的变法味呢？

这里有一件事我要提出的，即人类思维史的发展也有它的共性的一面。我国先秦时代百卉争荣的灿烂光辉局面，一步入中古，就转入折衷消沉。西方古希腊的繁盛思想，一到希腊罗马

时期，也同样转入折衷消沉。折衷主义的著名人物如罗马的西塞洛，也只是企图融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等相互对立的各派之说，并无新见。到了中世纪，就更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乞讨生活（12世纪前，是柏拉图的天下；12世纪后，转为亚里士多德所支配），竟成了思想上的黑暗时代（Dark age）。我国从秦到西汉以后，也是纷纷以注解经书为生，好象真理都被古经书发现完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的今文学家无论矣，即以唯物主义著称的人物，如杨雄、桓谭、王充之辈，也斤斤于古文经的探索。这些思想家也汲取两汉以来的科学成果，丰富自己的体系，但已无复先秦诸子的创造精神。佛教传入中国后，又添上佛典的输入与注疏，同样表现中古的特征。秦皇、汉武封建专制主义大帝国的建立和罗马大帝国的统治是否造成思想单调的原因呢？这有待于历史学家的深入探索。

我们再观印度的情况，也有和西方与中国相似的表现。古印度释迦牟尼时代，宗计繁兴，扫除婆罗门教的弊端，但到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统一全印度后，佛教普及全印，为适应印度各地人民信仰的需要，就不得不窜改旧规，把过去的咒术和迷信又收容教中，佛教由小乘变为大乘。这样，释迦在世时的革命精神全失。所以印度的中古阶段也同样步入西方、中国的命运。这又是一件可引为鉴戒的历史事件。

2. 折衷主义不但表现为杂乱的融合，而且还表现为互相抵牾，自相矛盾。

《吕览》对于墨家的态度既赞扬，又攻击。如《当染》篇称颂墨子和孔子并称。但《振乱》、《禁塞》和《大乐》三篇，却以墨子的非攻、救守和非乐为过。即在同一篇中，也有互相矛盾处。如《应言》篇司马喜难墨者师以非攻。司马喜赞成赵的攻燕，但反对赵之攻中山。这表现对墨子之非攻，既否定、又肯定。